

那天是母亲节,我事先不知,关门闭窗写作也被户外超高分贝音响惊扰,原来社区又在搞活动。居家社区的公园,本是提供静憩的,现在却时兴搞活动。人们在台下使劲怂恿孩子,要他们竭力高喊“妈妈我爱你——”也是有奖比赛,谁喊得最高最长谁就获奖了,抱得一些粗制滥造但看上去光鲜的流行玩具。

现在活动特别多,一年四季,社区很难有几天安静,没有节日也会制造节日,实在无节日可制造,就制造主题,比如“把爱喊出来”之类。一概是狂呼滥叫“我爱你”,一概是震耳欲聋。随后的六一儿童节,台上果然又挤满父母,亢奋地高喊“宝贝我爱你——”类似情形要人不发笑不可能,要人不发怒更不可能:直接联想是不遥远的前一个社会时段“文化大革命”。那也是活动特别多,喊声特别大。不同的只是,彼时高喊革命,此时高喊爱;

彼时动力是政治,此时动力是经济;彼时是闹革命,此时是闹时尚;我们多什么健忘!

“革命”大约是可以被喊出来的,爱却肯定不成。首先,爱是私人情感,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种爱。再者,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我们的文化更多蕴藉,更多含蓄,也更具体。千百年来,我们更习惯用行为来表达爱意。女孩子爱父母,是会“早早起,出闺房,烧茶汤,敬双亲”。儿子爱父亲,是可以一声不吭去卖身葬父。父母爱子女,是无条件地舍得一切,俗话是“水往下流”,文言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情人之爱,是眼里有,心里有,口里没有。夫妻之爱,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爱国家,也很具体,是“文死谏,武死战”。我们中

有效地爱

池莉



说不用喊,惟用心领会。爱的细微与无限,心有灵犀一点通,惊天动地而泣鬼神。把“I love you”挂在嘴边,那是他族文化,咱们模仿着大呼小叫,怎么都是东施效颦。尽管我们口里把爱喊得声嘶力竭,转身脸就挂下,照样啃老,照样要车要房才嫁,有孕有育才娶,照样把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带,或送进各种培优班,我们自己照样搓麻,照样“销品”,照样去干所谓事业。我们越来越随意地高喊爱,爱越来越变成表演与作秀,变成随波逐流的时髦字眼,变成空荡荡的无效感情。去年底,在英国,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当我注意到一楼大厅出售的中文介绍册,当即愣了:

译名还是“大英博物馆”。“大英”这个译名,大约是我们孱弱的历史造成的,但是到了今天,为何还在沿用?!汉语的“大”字,是有至尊意义有等级差别的,我们怎能自轻自贱?!尤其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就更应该自觉恪守国家无论大小民族无论肤色都一律平等的国际原则。人家博物馆名称,大门口刻得清清楚楚:British Museum,就是“不列颠博物馆”或“英国博物馆”,根本不是什么“大英博物馆”,为啥我们反而要这么叫?返国以后,我即写了文章,还特意发表在最重要的人民日报。然而,时至今日,全国所有报刊媒体以及民间口语,依然一口一个“大英”。就连这么一个极其不恰当的译名,我们都一直一直无动于衷,不能做出具体的质疑或修正,我们还一天到晚高喊什么爱呢?现在我们还能够真实有效地爱自己吗?我不怀疑,并倍感忧伤。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一个少年用一些生动的片段描写了自己一段人生的“冒险”。是“冒险”吗?当然是。我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封闭的大国。清末,因为有了一些挨打的教训,才有了一些有识之士,清廷才开始往西方派遣留学生,而且主要是一些娃娃留学生。即使后来到了“文革”时期,也还有少数娃娃留学生被派往“帝国主义”国家,应该说在当时是大怪事,又是大好事。当然,那些小留学生只是数量很少的红色嫡系,一种极为特殊的措施。“文革”以后,随着经济上的开放,公费与自费留学生才逐年增加,大多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后来中学生也渐渐多起来了。由于娃娃们的负笈远游,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距离会渐渐缩短。当然,直至目前,娃娃留学生的父母依然有不少顾虑和没完没了的牵挂,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19-20世纪去西方留学的青少年中,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精英;但也出了一些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的“假洋鬼子”,从西方带回来的只是一副盲公眼镜和一根stick。曾几何时,按有些人的观点,把娃娃送到西方留学,就是往“大染缸”里丢,直人云:“慎染”,我们的先人对于“染”是最谨慎的。我的朋友栗玲、田永昌夫妇就属于把儿子丢进“大染缸”一类的勇敢人物。他们为儿子田英人选择了一所美国名校——位于密西根州的美国私立圣玛丽男子高中。从作者的叙述来看,小主人公既没有受难的心境,也没有猎奇的心境;难能可贵的是,他每一步都有小心翼翼地理性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2009年8月17日,由于他差一天不满十五周岁,按美国西北航空的规定,不能独自登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被“托运”。于是,他就像一件贵重物品那样被“托运”到底特律。“被‘托运’的滋味真好!”反而比别人都顺利,第一段旅途就是一个喜剧式的开场,使他很受鼓舞。他知道中国和美国的中学大不相同,但进了学校,才知道美国的中学和中国的中学是大大不同。做了充分准备的他,第一堂课就迟到了,而且迟到的原因是找不到教室。圣玛丽男子高中压根没有固定的班级,当然也不会固定的教室和座位,更没有固定的同桌。之后,他才渐渐完全真正走进美国的中学生生活,在书中他还饶有兴趣给一些老师和同学画了一些生动的肖像。比如那位副校长 Mr Rycheik,既有驾着高尔夫球车凶狠地追赶上课缓慢的学生的一面,又有一天多次给当教师的太太送咖啡的一面。同学 Mickey,从北卡罗来纳开十三个小时车来密西根上学,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踢球,而圣玛丽中学的冰球队久负盛名。还有那位喜欢在课堂上和学生斗嘴的、另类的化学教师 Mr Morrison。这些陌生人都变得生动而极具体了。他终于喜欢上了美丽的学校和圣玛丽的老师和同学。从陌生到熟悉到喜欢,在生活中他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很多中西方教育、社会的比较和思辨。恐怕这是最了不起的了!

风自在,帆属于自己

白桦

漓江秀色

(中国画) 苏春生



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因素,不外乎天赋、机遇和勤奋。华东师大苏春生教授得天独厚,自幼受父亲、著名学者苏渊雷的熏陶和教诲,艺术启蒙比旁人早了一步。父亲的书画朋友常来家中相

苏式黄山

恽南铭

聚,江寒汀、唐云、钱瘦铁、陆俨少、谢稚柳、张大壮、吴青霞等是座上客。他们或挥毫作画,或诗酒流连,孕育了苏春生“胸藏千山万壑”的浩大胸襟与艺术志向。及长,他考入浙江美术学院,受到国画大师潘天寿、陆俨少、方增先的法乳,专攻山水兼学书法和画论。这一切,造就了难得的学者型画家苏春生。

“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苏春生塑造了具有独特韵味的“苏式黄山”:深峭、婉转、高远、宏阔,温润秀美,空灵奇诡。中央电视台为此拍摄了《苏春生画黄山》8集专题片;凝结了半个多世纪丹青生涯心得的《黄山写生要法》《中国水墨山水画教程》《中国山水技法教程》,成为广大山水画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不见面的老师”。年过七旬的苏春生回忆艺术道路上走过的风风雨雨,无不感慨。他对笔者说:“只有敬畏传统,感恩自然,克服当下画家心浮气躁状态,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作品来。”

苏春生跟随陆俨少学画多年。陆俨少说过:“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貌写各地山川对象,不能只靠一己的创造,我们不能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必须

现在的的确有人对青少年有诸多疑虑,其实,后生依然可畏!依然后生可畏。我自己也曾在英人同等级离乡,到只有百里之遥的异地求学。那时除了全力应对贫困、饥饿、功课和思乡之苦以外,哪有思想别的事情呢?所以,我要告诉英人的一句话就是:就这样生活,就这样学习!

风自在,无定向;而帆属于自己。

(本文系《美国高中怎么读——我在圣玛丽男子高中的学习与生活》序)

学习传统。”陆俨少学习传统全靠记忆加勤奋,凡看到古人的经典作品,便反复地琢磨强记,晚上背临,直到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印入脑中。他以博大的精神融会贯通传统,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笔墨语言而独步画坛。苏春生遵师傅嘱,努力打进传统又努力从传统中打出来,所画的山水,已不是荆浩的恣意纵横、关仝的笔简景少,也不是董源的林霏烟云和巨然的明润郁葱,而是儒雅、醇厚、宁静、温润秀丽的“苏式山水”了。

“好的山水画作品,都蕴含大自然博大的气质以及宇宙中生生不息的精神。”苏春生牢记父亲80岁时寄予的希望:“天开图画,春满乾坤”,要永远感

孙景路, 癸亥 1923年3月22日生于长辛店一个有骨气的铁路职工之家,16岁起即入唐槐秋创建的“中国旅行剧团”,献身抗日影剧活动。景路颖悟好强,戏路宽广,不论是“雍容威仪”的皇后、公主,还是备受凌辱的“名花”、“窑姐”,无不演得穷形尽相,妙肖传神。孙景路,尤以擅演善良豪爽、泼辣多情的女人形象而蜚声艺坛。乙丑 1985年4月,一位署名“弓介夫”的老观众,看了杨在葆与刘晓庆主演的《原野》后,特在一家美国华文报纸上撰文说:“演‘金子’,登峰造极的要算四十年代的孙景路(现在大陆,于《笔中情》中饰演‘长公主’)了。那是‘活金子’,她把‘金子’演绝演活,‘金子’就是她这个人……”卅多年前演过的角色,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景路演艺之精湛,于斯足见一斑焉。

就是这么一位演艺超凡、热诚仁厚的好人,在“文革”中却被迫为“文化特务”,而蒙受“隔离八年”的非人待遇,而终致身心两伤!幸至1976年10月,“四凶”翦除,她与丈夫乔奇才得以绝处逢生,重见天日。夫妻俩稍稍重整家园(由枕流公寓底层迁至七楼顶层)之后,就奋不顾身地投入演出活动。一如“枯木逢春”的孙景路,欣借秦怡、王丹凤、陈述、程之、于飞、曹铎、康泰……组成了演出队,一天连演八场,16个小时,大受欢迎。景路朗诵的任溶溶诗作《爸爸的老师》与歌颂杨开慧烈士的《忠魂曲》,在广大观众心中留下深刻而美

忆影人孙景路

宋连序

好的感受。

景路曾对我说:“演员须以艺德为重。”她孜孜以求的是艺术,从不看重个人名利,不论戏多戏少,均受命不辞。在经典影片《今天我休息》中,她出演一句台词也没有的“售货员”,亦心甘情愿之。桑弧执导《子夜》,她应邀担任“艺术指导”,始终早到晚退,守在片场,悉心辅导李小小、龚雪等后起之秀,赢得很大成功,影片荣膺大奖,而片头却漏置了“孙景路”之名,桑弧向她致歉,她却淡然一笑,毫不介意。由于“文革”落下之病根,当孙景路拍完最后一部荣获“金鹰奖”的《六岁大寿》时,已经发病,她仍坚持由家人陪护,去为饰演“奶奶”一角“配音”。这位德艺双馨的好演员,共产党员,缠绵病榻四年多,终于在1989年元月2日下午2时20分,被“尿毒”这个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记得不甘心只活了66岁的景路,临终前留给乔奇的“遗言”说:“晚上梦见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人打,不是那样,我不会这样。”为寄托对好友的哀思,秦绿枝先生特在元月15日的《夜光杯》上发表了题为《心病》的随笔云:“孙景路病死前的心病,正是我们这些人的心病。我们自己固然要再想开一些,也希望为去掉人们的心病所创造的和谐环境,再和谐一些。”这些不无“余悸”的话,饱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拳拳赤子之情,说得实在太合乎民心了!

是岁壬辰,适逢孙景路冥寿九十年与乔奇(1921-2007)仙逝五周年纪念,谨作斯文以怀之。

1960年,我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预科。我极其兴奋,全家欢呼雀跃,因为世代为农的陈家出了一个到城里去读书的孩子。我十分珍惜经过拼搏后得来的学习机遇,以勤奋、刻苦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预科的学习生活之中,目标是三年后考入交通大学,朝着工程师、科技工作者、专家的方向而努力。正当我在理想的道路上顺利前进时,1961年变化的形势,最终改变了我原定发展目标。

当时,由于我国处于困难时期,部队决定不向农村征兵,同时又急需一批文化水准较高的战士,去掌握先进的武器装备。于是,将征兵的对象转向了城市的青年。记得当时闹北区武装部的领导来到学校,与校领导商议后,向在校的学生作了参军动员报告。

对于有着强烈翻身感、来自世代贫苦家庭的我,牢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党和国家需要为当兵时,应挺身而出。我没有作任何考虑就报了名。开始,我总担心不会被批准,因为我年龄不满17周岁,身高不到1.60米,体重仅40公斤。但一切出乎我的意料,体格检查的每一项指标一一通过。很快,一张光

身体比炮弹轻

陈德良

去的列车。8月21日来到了福建前线部队。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一个人有时得放弃自己原定的理想、目标,人生才更有意义。

我所在的部队在漳州林下,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炮兵部队。我来到了基层连队,担任炮手。可怜的我身体没一发炮弹重。当时我们部队的大炮是1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射程一万米以上,一枚炮弹重41公斤,而我入伍时仅40公斤,来部队时经历了乘火车、坐汽车,加上大

热天,体重已降至37.5公斤。

训练中,我抱起炮弹(训练用)装进炮膛时,咬牙勉强抱起,几次下来,已是大汗淋漓,有时摔倒在地,我失声哭了,但还得爬起来再练。每当此时,战友、班长、连队首长过来安慰我、鼓励我。我没有退路,只能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增加力气。我的外号“小个子兵”就是从那时叫开来的。四个月后,我终于获得了成功,年终评我为五好战士时,全连全票通过,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我感到,在人生的路上,在艰苦的条件下,只要以自己的毅力坚持下去,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人,就是在不断战胜困难中前进的。

作为上海兵,我没有辜负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在部队5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被评为神炮手、二级技术能手。

从部队复员后,我回到了母校交大附中工作,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担任校领导20多年。2004年退休后,返聘至今。

我始终保持着人民军队的本色,牢记着:我曾是一名上海兵。

十日谈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征文选登)

明日请看一篇《艺术·人生·起跑线》



夜光杯